

报纸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闻教科书”

——对解放战争时期工农通讯员教育实践的考察

田中初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工农群众成为新闻通讯员是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为了帮助文化素养低下的工农通讯员参与新闻采写实践,许多报纸利用发行量较大、出版周期较短、贴近基层社会等优势,开辟出相关的专版或专栏,面向广大工农通讯员实施新闻业务教育,以期让他们懂得“怎么写”“写什么”和“怎么改”。“怎么写”让工农通讯员习得新闻采写的基础知识;“写什么”指引工农通讯员知晓革命动员所需要的文本呈现内容;“怎么改”则鼓励了工农通讯员的知识应用进而激发其社会主体感。在这样的多重作用下,报纸发挥了“新闻教科书”作用,推动一大批工农通讯员在与我党的同频共振中融入“党的新闻工作者”队伍。

关键词:解放战争;报纸;工农通讯员;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3-00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FXWB027)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掀起了经济翻身、政治翻身、文化翻身的热潮,广大人民群众在翻身运动中做了主人。在新闻传播领域,当时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基层工农群众以“工农通讯员”^①的身份投身新闻传播活动,成千上万的工农通讯员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②。通过采写新闻报道,工农通讯员成为联结党和人民群众的“中介”,在信息沟通上实现了“从群众中来”以及“到群众中去”的可能,促成了党和基层社会的紧密互动,也保障了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落地生根。

近些年来,在不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背景下,工农通讯员作为我党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色群体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相关文章从工农通讯事业发展概述、工农通讯员的动员策略、知识分子和工农通讯员的结合、工农通讯员如何在党群关系建构中发挥作用、工农通讯运动的组织开展等层面展开了探讨,使得历史维度的工农通讯员面相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饱满^[1-6]。然而,新闻采写毕竟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新闻业务知识,那么,对于文化水准和新闻知识都非常欠缺的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如何可能扮演“新闻传播者”的社会角色是一个需要细致探究的“谜题”。其中,对工农

①本研究聚焦的工农通讯员,是党报通讯员队伍中的一个类别,它与干部型通讯员、知识分子型通讯员等一起构成了党报通讯员队伍。工农通讯员突出了通讯员的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属性,其来源主要是基层的工农群众。鉴于当时的社会情境,工农通讯员队伍中的主要群体是农民通讯员,他们由部分工农出身的区乡干部和村干部、村民组成。另外,基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城市办报的实践,从工厂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体中产生的工人通讯员也构成工农通讯员队伍的一部分。

②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载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周年》中发出“全党办报”的号召,同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全党办报”,起到了把“全党办报”定型、固化以及推广的作用。因为有了“全党办报”的要求,工农通讯事业可以依托比较健全的党组织体系全面铺开。因此,1944年是工农通讯事业组织化、规模化、基层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到解放战争时期,出于解放区社会改造和战争动员的迫切需要,成千上万的普通工农群众投身通讯员队伍。虽然尚无数据进行总体统计,但从各地的总结中也可窥见当时的工农通讯盛况。如:在1946年一年中,山东鲁南地区工农通讯员由1583人发展到2389人,在292个村中组织起442个工农通讯组(《在一二等村里成立起通讯组来!》,《鲁南时报》1947年2月10日第5版);胶东地区也不甘落后,1947年该地区的新华分社已经有工农通讯组3598个,工农通讯员18670名,分社通联科每月来稿有16000篇(《工农通讯运动要再向前进一步》,《群力报》1947年2月7日第2版);到1948年春季,《盐阜大众》拥有工农通讯员8500多名,在4个月中收到的24800多篇来稿中,工农通讯员的来稿占到80%(郁启祥:《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盐阜大众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2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到1948年4月,华中淮海地区已经有通讯员10605人,其中工农通讯员7437人(《淮海通讯运动广泛深入》,《新华日报》(华中版)1949年1月6日第1版)。

通讯员的培养和教育就是一个关键的技术性环节,而过往研究对此关注相对偏少。因此,基于当时许多报纸开辟工农通讯专版、专栏的历史实践,报纸如何面向工农通讯员发挥群体性教育作用的专题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王润泽据此提出新闻实践史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新探索”^[7]。也就是说,对新闻实践路径、环节、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通过一些生动细节的复现来凸显新闻传播的中国特色。本文对这一专题展开回梳,就是希望给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群众办报”理念丰盈一些实践维度、历史维度的“血肉”。

一、报纸作为“教科书”:工农通讯员培养的现实需求

自清末以来,报刊已经成为中国最具革命性的传播媒介,况且在近代社会情境中,报纸作为最普及的大众媒介,理论上可以到达每一个社会角落,影响每一位社会成员。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8],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天天出版,数量最多,读者最广的一种刊物,没有任何其他出版物可以与之比拟”^[9]。因此,报纸的教育功能历来就受到我党的重视,特别是在交通不便、来往受限的革命根据地,报纸就成为一种学习教育的好形式,甚至被誉为是“人民的教科书”^{①[10]}。1944年,毛泽东在论述文化教育的问题时曾经谈及:“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所以他认为要把报纸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11]。简言之,革命的组织 and 动员有赖报纸的传情达意和文字理性作为支撑,而报纸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媒介。

对工农通讯员来说,报纸不只是政治学习的“教科书”,同样还是学习业务知识、增强角色技能的“新闻教科书”。这种新闻教科书功能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生成的,虽然苏区时期、抗战时期的一些报纸(如《红星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就已经面向广大通讯员(包括工农通讯员)开辟新闻通讯的教育专栏、专版,但主要面向工农群众进行群体性教育的专栏、专版却兴盛于解放战争时期。此间,随着工农通讯员队伍快速、大规模发展,以往主要通过报纸编辑部人员给个人写信指导以及集中开会进行指导等方式显然已经是杯水车薪,而利用辐射面比较大的报纸对广大工农通讯员进行教育,无疑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对此,新华社冀中分社认为:用个别复信的方式指导工农通讯员是一种“手工业方式”,在“通讯基础日益巩固扩大”“稿件数量日渐增加”的情况下,“那种手工业方式的指导方式已经不行了”,于是他们就采取在《冀中导报》上开辟《通讯往来》专版的办法,把许多稿件存在的问题,“分门别类地综合在一起,写成有系统的意见”,以半月一次的频度在报纸上统一回复。报社人员认为,“这样综合许多篇稿子的意见,有系统、深入得多了。只要同志们把那些意见和自己写稿的具体情形联系起来好好地想一想,我们敢断定,比每篇提个三句五句意见贴在稿子上退回去作用要大得多”^[12]。因此,他们希望工农通讯员能把“对退稿信的热望,转到《通讯往来》上来,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它会给予我们比一封信更多的东西”^[13]。由此,以报纸为依托,一种面向工农群众的新闻教育路径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报纸面向大众,方便报纸编辑部对工农通讯员群体进行广泛指导,于是在报纸上开辟与工农通讯工作相关的专版、专栏就成为解放区各报纸的一种普遍做法。如《冀晋日报》的《通讯学习》专版,在开设之初就提出需要写作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经验、培养工农通讯员及农村通讯小组经验等稿件^[14],从中可见该版面与工农通讯工作的密切关系。山东《渤海大众》为“专门帮助咱工农通讯员学习写稿、交换通讯工作经验和好办法”而决定经常出版《工农通讯》专栏,主要内容包括:经常告诉大伙眼前要写什么稿子、怎样写,介绍写得好的稿子和写得差的稿子,和大伙研究写稿办法;介绍各地工农通讯工作的情形,交换经验;表扬和介绍积极的通讯员和通讯组等内容^[15]。《盐阜大众》报曾出刊《盐阜通讯》专版,在第一期的《开头话》中直言:“《盐阜通讯》是为大家服务的,特别是为工农通

①胡乔木在1943年1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报纸是教科书》一文中提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光有一套“新闻学常识”是不够的,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值得注意的是,该版内容是《解放日报》专门为通讯员而办的《新闻通讯》第2期,所以,“人民的教科书”既是对新闻工作者办好报纸的期望,同时该版面本身也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教科书”。

讯员服务的,因此,应该怎样办、如何办得好,希望大家动手、动脑筋,多多为它写稿,多多向它提意见。使它成为我们通讯员自己的业务园地。”^[16]后来,《盐阜大众》还增设《工农通讯》专版,9天一期,指导工农写稿^[17]。除了介绍工农通讯员的写稿经验,还解说怎么写新闻、小通讯、小故事的方法,并答复工农通讯员提出的一些写作问题^[18]。随着各大城市的解放,面向工人通讯员的报纸教育也同样得到重视,如《察哈尔日报》从1949年3月10日起开辟了《新闻通讯》专版,在征稿启事中,特别希望有工人通讯员写稿经验、介绍帮助工农通讯员写稿好办法等方面的文章^[19]。因此,报纸开设通讯专栏或专版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工农通讯员采写能力的提高进行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思想政治层面的指导,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让广大工农通讯员知道“怎么写”“写什么”以及“怎么改”。从表面看,这种显性的知识输出和训练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工农通讯员的文字水平、采写能力,以服务于解放区现实的新闻宣传工作;而其潜在的隐性功能则在于对他们进行报章文字表达的思维训练,使之理解党所倡导的理论目光、工作方法,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的提高,将有助于工农通讯员从普通群众中脱颖而出,从而为解放区的基层传播、基层社会改造提供人才储备。

二、怎么写:投身新闻采写的知识准备

对于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工农群众来说,面临着文化素养低下的传播困境,更遑论投身新闻采写。因此,“怎么写”在报纸培养工农通讯员的过程中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知识准备环节。为普及新闻知识,报纸会发表一些适合工农通讯员阅读的关于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制作新闻标题、如何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等指导性的文章,让他们对新闻采写有基本的感性体认和知识铺垫,并且通过意识形态植入的方式来标定工农通讯员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以调动其革命情绪。

对于“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农群众来说,用工具干活才是他们最熟悉的角色行为,用笔来进行新闻采写实在感觉太过陌生。有的工农群众不知道新闻通讯员是干什么的,当别人来动员时,居然惊讶地说:“怎嘞!叫我跑信呀!”后经解释清楚才知道什么是通讯员^[20]。很多工农群众担心自己的文化水平低,认为不能参与新闻采写是普遍的心态:“咱大老粗,哪能会写文章!”“我已活了半辈子啦,还能写稿吗?咱人老心笨,天天手不离锄,哪有心事捣弄笔杆。”^[21]“自己肚里没墨水,连话都讲不顺溜,怎样能上报?”^[22]针对工农通讯员反映的这些无感、畏难心态,有关新闻采写的一些基础知识介绍就成为这些专栏、专版的常规内容。山东《滨海农村》在1947年4月27日刊发的《这五条不能少》,就清晰明了地介绍了稿件的五要素: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都是哪些人;是个什么事,写事情的经过;现在怎样了,以后可能怎样^[23]。《鲁中大众》报曾经在《文化翻身》版面中开设《啦啦写稿》专栏,介绍新闻采写的系列基本知识。如1947年4月2日在专栏中刊登的《不能都写成一个样子》文章,就针对来稿千篇一律的问题,指导工农通讯员写稿如何写出“不同的地方来”。^[24]为了让工农群众好读好懂好记,一些报纸就把新闻采写知识做了通俗化的转化。《冀中导报》上发表过一首《写稿歌》:

想要写稿别发愁,搜集材料要讲究。有了材料细细想,怎样煞尾和起头。定出提纲有条理,抓住中心别胡诌。定出题目再细看,无用字句一笔勾。写完拿着找人看,虚心听取别嫌丑。最好写谁找谁念,他的事情了解透。哪处不对叫他说,这样修改最讲究。文盲同志不能写,别人代笔别害羞。集体写稿办法好,多写稿子多研究。整理好了马上寄,切莫失去好时候。假如你能常常写,稿子一定有成就。^[25]

这首言简意赅的歌谣完整地梳理了写稿的整个过程,后来不少报刊都曾转载。而《冀中群众报》则曾以快板的形式来教导大家:

写稿同志们听我学:顺口溜,数来宝,大鼓书,小歌谣,街头诗,和小调,大洋片,也挺好,农民们,都喜好,又爱听,又爱学,中的用,真不小。这类稿,不算少,好多的,登了报,也有的,退回了。为何退,为何登,这道理,来说清,最大毛病是空洞,光喊口号没内容,几句名词来回用,着人听了脑袋疼。……想写好,不费难,有个诀窍咱谈谈,要写真人写实事(儿),苦乐悲欢都有劲(儿),

村子里边材料多,你别关门造大车,找了材料你再编,巧媳妇难做无米饭。要写老乡们心里话,千万你别闹字眼。^[26]

短短的一段快板,不仅介绍了稿件的体裁,还对什么是好稿件、什么是坏稿件做了对比,让读者心中一目了然。不同于教科书的新闻理论知识体系化介绍,通过偏向工农群众语言的在地转化,这些顺口溜、快板、歌曲用工农群众所喜爱的方式,把写稿的体裁、内容、语言等要求以要点性说明的方式、以朗朗上口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助于工农群众对新闻基本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起到“听声识理”的辅助效果。

为了增强指导工农通讯员的及时性,一些报纸就利用中缝或者报名旁边的报眼位置来刊登相关内容,这种版面安排方式比定期出版的专版、专栏形式更机动,而且增加了业务知识和工农通讯员的“见面频度”。《苏北日报》曾在报头边上的两只报眼刊登指导新闻业务的文字,每天七八百字,一个月就有两万多字,内容不比一本新闻业务刊物少,而及时性和广泛性却要远远超过业务刊物^[27]。《苏中报》的中缝有一个固定栏目《通讯工作》,其作用之一就是介绍新闻报道的基础知识。针对一般来稿中存在公式化、一般化,没有中心、不写群众、不写典型等问题,先后发表了《提倡做什么写什么》《一个新闻有一个中心,一个新闻说明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新闻写得通俗些》《我们怎样帮助工农干部写作》等文章予以辅导^[28]。苏中《紫石大众》的中缝刊登过一篇《大家来写叙事的小调儿》文章,建议叙事的小调着重写一件事情,要有名有姓、有头有尾,前前后后,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把一件事情用小调儿编起来,像是说故事^[29]。这篇稿子提出的“叙事”性小调,是适合工农通讯员新闻采写的一种创新,既适合了工农群众的口味,又可以通过增加叙事的内容来增强新闻的色彩。

工农通讯员的新闻采写并非单纯的信息传播,更是一种以革命为指向的社会动员,因此报纸在介绍新闻知识时,注重融入“阶级立场”,以此来凸显工农通讯员的社会身份和激活其革命热情。《新察哈尔报》上写给工农通讯员看的一篇《写稿要真实》的文章这样写道:

咱们写稿,不管在本村黑板报上登,或是寄给报社,都要注意一个最要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真实。为什么写稿一定要真实呢?因为咱们写稿,是宣传教育老百姓,是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服务,就不能有一点虚假。无中生有,说谎话,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封建势力,欺骗穷人的办法。咱们的报纸,是老百姓的报,也是共产党的党报;村里的黑板报,也是一个村老百姓的报。咱穷人和共产党办事,都是没有虚假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丝毫也不应该马虎。^[30]

短短的一两百字,不仅把新闻要真实的要求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给讲明白了,而且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作出感性的划分。《盐阜大众》针对工农通讯员不敢找批评报道材料的情况,把“怕得罪人”的思想上升为“没有决心站稳立场,计较自己个人的利害”,认为只有冲破这一关,才能找到“与工农兵解放有好处的材料”。^[31]通过这样的启发、引导,就赋予批评报道以正当性、合法性,让工农通讯员更有勇气监督基层社会中的负面现象,从而有助于通过舆论的力量推进基层社会的治理和改造。

“怎么写”的教育对工农通讯员是富有成效的,如工农通讯员王洪恩看到《冀中导报》上刊登的《写什么怎么写》一文时,“我连着看了三四次,很高兴,我今后写稿就敢写了,也知道点怎么下手了。过去我写稿总认为自己写的不好,写的很多撕的也不少……”^[32]一些工农通讯员结合实践体会,会从自身的视角写出对新闻采写的认识,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启发其他工农通讯员。如《黄海大众》上登过工农通讯员写的一段快板,介绍找材料的经验是“听到也好,看到也好,做过的更好,只要事实真,意思好,泥腿子说话不嫌弃”,在写作形式的选用上“歌谣小调实在好,新鲜又灵巧,有趣故事和笑话,不怕肚子笑疼眼笑小”^[33]。在《嫩江农民》上,还刊登过农民通讯员写给农民通讯员的信,以自己的经验来讲解新闻写作的要领:有啥写啥,做啥写啥,多写庄稼人的话,叫大伙都能懂。编者在按语中认为“这是互相学习的好办法”^[34]。1949年4月8日北平《大众日报》还专门刊登了《工人写稿经验谈》的一组文章,内含5位工人通讯员所撰写的《这样咱也能写稿》《写稿不怕人笑话》《我怎样学习写稿》《不登也不灰心》《当了通讯员得到的好处》等体会^[35],这些文章以相同身份者的视角来进行表达,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共鸣感。

三、写什么:革命动员所需的文本导引

党领导下的报纸是以文本的方式来呈现革命实践进而推动革命动员,在报纸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哪些事情可以转化为文本、哪些事情需要重点报道、哪些事情可以不予报道等问题,就成为新闻采写教育中的必修环节。而对于生产、生活在基层的工农通讯员来说,由于经历、视野所限,“写什么”经常是困扰他们的大问题。如有的工农通讯员听说写稿就是写身边的事时,写成的稿件就会反映猫吃小鸡、小孩摔碎饭碗被娘打结果要和娘“离婚”、小学生种菜等五花八门的事情^[36]。当听说“好的坏的都可以写”的笼统要求时,就把写稿内容局限在批评和表扬的狭小圈子里,最后甚至发展到互相打击或者无稿可写^[20]。类似放任自流的新闻报道显然缺少革命动员的能效,因为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出于我党领导下的报刊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的需求,报纸更需要的是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的稿件。因此,报纸刊登文章对采写内容进行要点式的说明,不仅能指明写作方向,让工农通讯员知晓选择哪些生产生活内容进行媒介转化,还可以通过工农通讯员的报道,形塑社会舆论氛围和情感倾向,把更多的工农群众召唤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

土改时期,苏北《黄海大众》在答复工农通讯员的一封信中说,写什么好?一句话就可以答:写老百姓怎样过日子。为什么要写老百姓怎样过日子?因为报纸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要指导老百姓怎样过日子。过日子不单单是一天三顿山芋干粥、捧牛屁股、下田干活、养大头儿子,凡是老百姓过日子中所做的事情,如种庄稼、换工互助、纺纱织布、土地复查、站岗放哨、拥军优属、上春学冬学等,“一塌括子都可以写”^[37]。这些个体重复的生活“碎片”经由报纸的公开报道可以赋予公共的指导意义,赋意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彰显。针对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很多时候报纸对“写什么”会有更具体、更及时的规定。如土改运动是解放区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报纸在这方面的内容规约非常全面也非常细致。《鲁中大众》的一篇文章这样引导:每个工农通讯员同志都写一篇穷人受苦的稿子。把自己所知道的或是自己亲身受到地主的压迫剥削写出来。每人至少一篇,多了更好。^[38]在此基础上,为了让采写内容更加明晰化,《鲁中大众》进一步刊文说明具体内容,呼吁工农通讯员要“把以下几个问题,找实际材料,写成稿子”:穷人文化不翻身受的痛苦和吃亏的例子,地主封建势力用文化统治压迫穷人的办法、例子,个人文化翻身的经过和参与写稿的办法和经验,介绍在土改复查中、对敌斗争中黑板报起的作用以及怎样成立、领导、组织读报组等^[39]。1948年7月,《海启大众》结合当时的实际工作,在一篇《眼前写什么稿子》的文章中要求工农通讯员围绕生产劳动中的积极生产、检查评功以及互帮互助的情形,各区开展学习的成绩和典型,各区武装备战活动内容写稿^[40]。依循这样的指向,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可以与我党在一时一地的中心工作密切呼应,报纸的新闻文本与现实的革命实践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从而在社会传播中完成议题设置、引发情绪感染,使党的号召、政策在群众心目中更具威望感和执行力。

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部分报纸开始进城办报,需要迅速地让工人阶级成为新政权实施城市治理的社会基础,于是发展工人通讯员也成为当务之急。一些报纸在发动工人通讯员写稿时,也会对“写什么”作出一些具体指示。如山东《鲁中南报》在《大力发动工人同志写稿》的一篇文章中启发工人通讯员:只要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不论生产学习,无不欢迎。比如新海发电厂正在修理锅炉,这锅炉是怎么修起来的?遇到了些什么困难,怎样克服的?在修理中谁工作最积极?谁有了什么创造?又如济宁的铁工厂,现在怎样制造了大批的农具?怎样提高质量?再如新海、济宁的工人同志,解放将近一年了,在这期间自己在政治觉悟上的进步,文化与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劳资关系有哪些改进,还存在什么问题,工人同志对各种工作的意见以及有什么困难等,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写稿材料^[41]。像这样的指示非常清晰、具体,对工人通讯员来说是很好的指引,也便于实际操作。从更深层次而言,这些导向和提示也有助于工农通讯员从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的角度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教育,这对工人群众主体意识的塑造有催生意义。

除了指明具体的写作内容之外,报纸还不断鼓励工农通讯员“做啥写啥”。《工农兵》曾在《给“工农兵”写稿办法》中启发大家:“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怎样做的就怎样写,你做的什么事情,

便写什么事情,只要这件事情与大家有关,详细地写下来,就是好文章。自己知道别人的事,当然也可以写。”^[42]《冀中群众报》特别鼓励写“眼下”在做的事,“咱眼下做着什么就写什么,比方咱们正闹翻身地呢,那就写翻身地的事。大伙觉着那件事该登报,咱就写写那件事,说咱心眼里话,写咱自己的事,也写地主富农的坏事,为的好斗他”。^[43]《黄海大众》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认为“工农同志,初初拿起笔来写稿,真不像扶犁稍耕田那样把用”^[37],因此写稿要写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事,打个比方说,要我们泥腿子写或讲过去地主的压迫派干,大家包都说得活龙活现的,能把听的人说得哭起来。我们泥腿子都是在地主压迫派干底下熬过来的,怎么不最熟悉这些事呢?若是要我们泥腿子去写个洋学生怎么念书的,那只好大眼直翻”^[44]。让工农通讯员写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由于有非常实际、生动的具象感知,因此也就容易写出实实在在的内容来。“做啥写啥”不仅让工农通讯员有话可说,写作变得容易,更重要的是个体层面生活的对象化审视和梳理勾连着社会行动和秩序建构的合理性。这些工农群众正在做的事情,往往也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所发动的需要群众做的事情。这样,党的号召—群众行动—群众报道—更大的群众行动就有了螺旋向上的可能。

四、怎么改:知识应用与主体感激发

工农通讯员属于业余新闻工作者,新闻采写并非他们的主业,更不是他们的强项,因此用适当的方式促发工农通讯员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化,让他们有新闻知识的应用空间,进而唤醒主体感的生长,许多报纸采用了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做法,让工农通讯员运用新闻知识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社会主体意识。比如通过刊登工农通讯员的新闻稿件并附带修改意见的“怎么改”就是有效的方法。当时,许多报纸开辟以“工农”冠名的新闻报道专栏、专版,既给工农通讯员提供更多的发表稿件机会,同时又对他们的稿件在尊重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通过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方式,工农通讯员有机会参与新闻知识的实践与转化,从而激发了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的主体感。

1946年初,盐阜地区的《盐阜大众》开辟《工农习作》栏目,专门刊登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并予以具体的点评,因为其“指导性强烈,能全面地指出各种不同的类型稿件的优缺点”,所以“给工农通讯员,尤其是新学写作的工农通讯员一副很好的借镜”^[45]。1946年4月1日,《大众日报》在第4版开辟《工农园地》专栏,该栏目发表了很多“工农写工农”的作品,其中有的在农村剧团演出,有的成为冬学教材^[46]。山东《鲁中日报》《鲁中南报》都开辟过《工农习作》刊登工农通讯员稿件,对第一次来稿或几次来稿都没有采用的工农通讯员的文章,尽量优先发表以保护他们的写作热情和信心。《工农习作》还介绍提高写作水平的经验,表扬帮助工农写作的积极通讯员,介绍各地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等,从而使“工农写,写工农”口号落到实处^[47]。1946年6月,《大连日报》针对“旧社会苦大仇深,解放后初学文化”的工农群众开设了《工农园地》专栏,以工农群众的稿件作为学习材料,培养了一批工农通讯员^[48]。其中的优秀作品后来还选编成《工农园地选集》由大众书店出版,被著名作家阿英誉为工农群众“文化翻身初期的里程碑”^[49]。1946年8月,《烟台日报》开辟《工农园地》专版,表示“在这个园地里面,要专门登咱工农写的稿子”“希望通过这个《工农园地》,使大家能够慢慢提高文化水平,练习写稿,学会看报”^[50]。报纸通过版面调度,保证了工农通讯员稿件得以最大程度的纸媒呈现,让工农群体的生产生活在社会话语中获得能见度,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工农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社会的肯定。同时,新闻文本的生产过程也会塑造工农群众的一种新的话语表达方式。

这些专栏、专版同时也是新闻报道“以案说法”的阵地,让工农通讯员从一些“正面”或者“负面”案例中获得启发。为了增强对比感,专版经常把工农通讯员来稿原文照登,在错别字的后面加上括号,里边标上正确的字。同时,还加上编者的评介,具体指出稿件中的优缺点,以此来辅导广大通讯员写作^[51]。1948年2月,《淮海大众》开辟了《工农学写稿》栏目,在第一期中就选登了工农通讯员陈珍写的《崔三娘积极弄公鞋》:“沐阳周集区周集乡老集村14号削(消)息:张庄崔三娘讨做公鞋飞(非)常级级(积极),叫她弄一双公鞋,她一点不将(讲)架(价)钱。她把鞋料领回家,三天就做好了,鞋邦(帮)纳(衲)九行,鞋底纳(衲)得后(厚)。”^[52]这种对稿件错别字的直观呈现,更方便读者

对照提高。在山东《群力报》《通讯与读报》专版中,《工农习作》栏目把工农群众原来的稿子和改过的稿子对照刊登;《编者意见》栏目指出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大家来改文》栏目鼓励大家一起来找一篇稿件的优缺点。^[53]这样,一个版面的内容就让工农通讯员通过多种形式得到学习领悟和锻炼提高的机会,因此大受欢迎。一些工农通讯员赞扬《盐阜大众》的《工农习作》栏目:“以前只晓得写,那块晓得什么缺点不缺点,也不晓得什么是中心”“《工农习作》说的真使我入窍,我时时刻刻想写稿就是不会写,这一家伙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一条写稿的门路”^[54];有的工农通讯员甚至把《工农习作》栏目称为永远忘不了的朋友,要“永久地保存着你!”^[55]后来《工农习作》因故一度停刊,结果在“好多工农通讯员同志来信,要求继续出”的要求下复刊^[56]。黑龙江北安机务段工人通讯员田雨中写了一篇稿子后,刚好看到《新黑龙江报》的《工农通讯》专栏中有一篇《这篇稿子为啥没用》的文章。他对照着一读,感觉自己也犯了“一般化的毛病”,于是就根据报纸指导重新写了一篇^[57]。这些专版、专栏把具体稿件的修改过程呈现出来,不仅让知识修补的个案变成公开表达的事件,还使文字背后的思想观念、思考方法、阐释角度成为一种显性可学的知识,让工农通讯员通过自我阅读即可领悟内化。

报纸上还经常以回信、编者按、编后语等方式来讨论具体的新闻采写。1947年2月21日的《群力报》上,刊登过楼东县铁口镇西牟家庄工农通讯员柳忠言写给报社编辑科同志的一封信,报告了村里群众合力帮助一位家里失火贫农的情况,并询问这种“千家帮一家”的事情好不好。报纸把这封信原文照登,给错别字标明正确的写法。在此基础上,又专门在信件的后面附言,请大家都来研究:这篇稿有什么优缺点?这件事处理得对不对?并希望各村通讯员都开会好好讨论这封信,最好能在见报后5天里,把讨论的意见捎到报社,以便在下期《通讯和读报》上刊登。^[58]把这样的信刊登在报纸上,相信当事人看到之后会非常受益,而对其他人来说,又像是接受了一次新闻采写的业务学习。给稿件配上编者按或者编后语的方式,也有助于工农通讯员的业务学习。太行版《新华日报》提倡在发表工农兵通讯员来稿时要加上编者按语,以便使读者的理解与编者的意图结合起来。^[59]《冀热辽导报》1948年3月20日第1版曾经发表过三区棠梨沟村通讯员集体写作的《宝源棠梨沟农民分完土地乐翻身》。这篇报道得到该报编辑部的很高评价,特意为它加了一个编后语:“这篇东西,我们除加了一句导语和改了个别白字,原文一字未动……工农通讯员能有如此创作应受到奖励。”^[60]这段编后语不仅是对作者的鼓励,也是对工农通讯员群体的明晰工作指引。编后语还经常就报道的写作优点和缺点进行指导,使读者能够得到直观的启发。苏中《紫石大众》在刊登一篇《女民兵打坝》的稿件时,编辑以编后语的形式进行点评,希望初学写稿的同志将这篇东西作为写稿的参考^[61]。而报纸上更多的是如何改进稿件质量的建议,《盐阜大众》就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在一篇报道阜东县糜滩区郭集乡陈庄村干部陈如兆带头缴粮被奖励一面飞机旗的新闻之后,编辑进一步提出三点具体修改意见^[62]。像这样的编后语表扬、意见和建议都很具体,既让人明白优点所在,也让人知晓缺点所存,既涵盖新闻技巧,又指向“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相当于给作者本人和其他工农通讯员上了一节问题导向型的业务“微课”。这些“微课”清晰地展现了报纸编辑与工农通讯员的互动过程,它们让报纸成为一个业务知识的互动平台,是特殊历史时期对报纸单向传输信息的一种功能改造,有助于实现彼此间相对平等而坦诚的沟通,也有助于工农通讯员主体感的社会养成。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工农通讯员的主体意识,有些报纸还主动吸纳他们成为新闻作品的“评价者”。在这方面《盐阜大众》就有好的做法,如在1946年5月8日的一篇工农通讯员稿件的编后语中提到:先不指出这篇稿子的具体毛病,而是请盐城四区、射阳三区、阜宁东坎区等中心小组和工农通讯员曹景虹、张福春、颜景詹、费余庆等同志先提意见来,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以及编辑的意见一起发表^[63]。这种让“自己人”对“自己人”的稿件“发声”的做法,可以视为一种“兵教兵”的方式,容易拉近说教的距离,是中国共产党“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方法论的显化和外化。同时,评论他者的稿件是对自身业务水平的提升和理论知识的凝练,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教育,对评论者的主体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结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新闻报刊一直都是中共进行政治、文化宣传的重要工具”^[64]“世界

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过程中,恐怕还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对这么多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运用通俗报纸来做农民的工作”^[65]。报纸是支撑革命行动的支柱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报纸作为“新闻教科书”发挥的作用,不是表面的教导采写新闻这么简单,事实上它是一场对个体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普及型教育,其深刻性和复杂性体现在对工农群众写作理性的培育、主体感的激发以及党的意图延展、党的工作方法推广等多重意涵。以如此背景和立意观之,破解在文化方面具有先天劣势的工农群众如何参与办报这一“谜题”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考虑到革命情境中的新闻传播既注重事实又注重宣传的特性,对工农通讯员的培养自然也涉及知识技能和观念意识的双重涵育。工农通讯员在参与新闻采写之前已经成年,具备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学习新闻采写的过程,也是自己思想价值体系重新塑造的过程。就此而言,报纸作为工农群众的“新闻教科书”,是需要从表层知识习得和深层观念塑造如何“表里互应”的角度而加以审视的媒介。为了让工农群众以新闻通讯员的角色参与新闻采写,党组织、党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细致的引导,其中利用报纸对工农通讯员进行新闻采写的知识传播就是其中的路径之一。以报纸为媒介,工农通讯员一方面学习到新闻采写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又在知识表象之下融入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观念。在知识和观念并行的教育中,一大批工农群众由于具备一定的新闻采写技能而接近新闻媒体,彰显了工农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见度。同时,通过报纸的教育,工农通讯员意识到自己要代表工农群众为革命发声,在与我党的同频共振中融入“党的新闻工作者”队伍。由此,新闻采写成为塑造现代理性主体的中介,它促使工农通讯员对自身社会行动进行反思和赋予意义,使其对现实的生产生活和革命行动展开对象化的审视、符号化的表达,其中就蕴含着意识形态的调度、挪移和转译。以何种立场理解新闻,以何种标准选择新闻,以何种形式书写新闻等等这些环节都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自觉嵌入”和“自我内化”提供了天然的契机,包含看待生产生活的视角、分析变化成因的路径、解释事件意义的构成……“新闻真实”“新闻选择”“新闻价值”等等新闻理论的意涵也在这种普泛的传授互动中习得。因此,报纸的“新闻教科书”意义就体现在通过看似事无巨细的新闻事实表达、新闻立场教育、新闻写作评议等操作环节的知识输出,来引导工农通讯员完成对党的新闻理论及其主导意识形态的涵化。

报纸作为“新闻教科书”所呈现的广泛社会性和底层特征对我党新闻教育的建构与历史反思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理想的党群关系是一方面群众能够听到党的呼声,配合党的社会建设规划;另一方面是党随时倾听群众的吁求,根据实际状况和群众反馈进行工作方式的调整。这就需要政党与工农群众之间势必要形成“信息、知识、情感的广范围、高强度互动”^[66],因此也就需要“一整套与之匹配的全新的传播构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将群众的声音诉求、文化表达、信息接收纳入制度化的大众传媒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之中;二是通过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等方式重塑能动的群众主体,提升群众的媒介素养与政治参与,使其有能力成为社会变革的发声者、行动者与参与者。^[66]报纸作为“新闻教科书”成为一种新闻教育路径,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群众路线有了“落地”的可能,“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也能够的新闻实践中得到有力保障。历史的回视犹有当下的价值: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当下,以怎样的路径去引导、提升基层群众的新闻传播素养进而改善新闻传播的生态品质,引导人们理性、有序地通过新闻传播参与社会治理,依然可以是一个常思常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林棵,王建华.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党的文献,2019,4:91-97.
- [2] 李海波.“细腻革命”: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分析.出版发行研究,2019,4:100-105+89.
- [3] 邹阳阳,严三九.多层嵌套的情感动员:革命时期党报工农通讯员群体实践再思考.中国出版,2022,5:55-60.
- [4] 周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工农通讯员制度的生成与运作.中共党史研究,2017,1:44-56+100.
- [5] 刘慧珍.对工农通讯员制度的传播学解读——以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为视界.编辑之友,2012,11:112-114.

- [6] 田中初. 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通讯员为视点.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 3:11-20+110.
- [7] 王润泽. 实践史: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新探索——读张垒博士的《中国新闻业的起源》. 新闻与写作, 2019, 11: 85-86.
- [8] 展开通讯员工作. 解放日报, 1942-08-25.
- [9] 党与党报. 解放日报, 1942-09-22.
- [10] 乔木. 报纸是教科书. 解放日报, 1943-01-26.
- [11] 毛泽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14.
- [12] 新华社冀中分社, 冀中导报社. 为什么退稿工作有了变更. 冀中导报, 1947-07-08.
- [13] 新华社冀中分社. 新华社冀中分社给通讯员同志们的一封信. 冀中导报, 1948-09-21.
- [14] 编者的话. 冀晋日报, 1947-06-02.
- [15] 开场白. 渤海大众, 1948-11-11.
- [16] 开头话. 盐阜大众, 1948-07-10.
- [17] 盐阜大众报报史编辑委员会. 风雨征程:盐阜大众报五十年(内部资料), 1993:184.
- [18] 秦加林, 陈允豪. 回忆盐阜大众报(内部资料)//钱小惠, 金华彬, 秦秋谷. 秦加林纪念文集, 2006:69.
- [19] 《新闻通讯》征稿启示. 察哈尔日报, 1949-03-10. 扬州市档案馆, 馆藏编号 620-056-002.
- [20] 映鲜. 钱庄村的工农通讯工作. 业务通讯(华中《新华日报》采通科), 1948, 4/5:5.
- [21] 克服困难把工农通讯运动开展起来. 滨海农村, 1945-12-01.
- [22] 冯诗云, 章容. 如何发展工农通讯员新大众通联工作的一点经验. 人民日报, 1947-09-14.
- [23] 王华. 山东解放区新闻史(1937—1949).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255.
- [24] 不能都写出一个样子. 鲁中大众, 1947-04-02.
- [25] 写稿歌. 冀中导报, 1947-10-09.
- [26] 田可. 给写稿同志们的一封信. 冀中群众报, 1948-02-25.
- [27] 王维. 革命战争年代江苏盐阜地区的通讯工作//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7:25.
- [28] 卢敏. 《苏中报》的通联工作回顾//新四军历史丛刊社. 回忆苏中报. 上海:百家出版社, 1992:135.
- [29] 大家来写叙事的小调儿. 紫石大众, 1947-07-19.
- [30] 工农通讯员读本第十七课写稿要真实. 新察哈尔报, 1948-07-11.
- [31] 怎样找材料. 盐阜大众, 1946-04-20.
- [32] 写通讯不是难事(给小贞、王洪恩同志的公开信). 冀中导报, 1948-03-23.
- [33] 工农樊天佑. 写稿真正好(快板). 黄海大众, 1947-09-02.
- [34] 吕祥. 我的写稿经验. 嫩江农民, 1949-02-04.
- [35] 工人写稿经验谈. 大众日报(北平版), 1949-04-08.
- [36] 柳. 写稿以前请你先想想! 冀中导报, 1948-07-23.
- [37] 凡. 写什么?——答工农通讯员毛复才同志问(一). 黄海大众, 1947-04-25.
- [38] 鲁中大众社. 给工农通讯员同志的信. 鲁中大众, 1947-11-15.
- [39] 鲁中大众社. 写这样的稿子. 鲁中大众, 1947-11-21.
- [40] 眼前写什么稿子. 海启大众, 1948-07-12.
- [41] 编辑室. 大力发动工人写稿. 鲁中南报, 1949-09-18. 扬州市档案馆, 馆藏编号 620-055-004.
- [42] 给“工农兵”写稿办法. 工农兵, 1946-05.
- [43] 要给咱自个的报写稿. 冀中群众报, 1948-01-01.
- [44] 凡. 写什么?——答工农通讯员毛复才同志问(二). 黄海大众, 1947-05-05.
- [45] 对《工农习作》意见. 盐阜大众, 1946-02-25.
- [46] 新华社. 《鲁中的工农通讯员》(1945-3)(内部资料)//新华社冀东分社. 通讯工作经验(第1辑), 1947:11.
- [47] 范晓苹.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工农通讯运动研究——以《大众日报》(1943年至1949年)为中心的考察. 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28.
- [48] 王凡. 《人民呼声》和《大连日报》早期的副刊(内部资料)//大连日报社. 大连日报史料集. 1985:142.
- [49] 阿英. 序言//大连日报. 工农园地选集. 大连:大众书店, 1948.

- [50] 几句话. 烟台日报, 1946-08-29.
- [51] 郁启祥.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盐阜大众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第 28 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81.
- [52] 陈珍. 崔三娘积极弄公鞋. 淮海大众, 1948-02-24.
- [53] 这么办好不好? 群力报, 1947-02-21.
- [54] 对《工农习作》意见. 盐阜大众, 1946-02-25.
- [55] 工人通讯员江培明. 我爱《工农习作》. 盐阜大众, 1946-03-15.
- [56] 通讯部. 习作的话. 盐阜大众, 1949-06-02.
- [57] 工人通讯员杨鸿钧领导通讯小组有成绩. 新黑龙江报, 1949-05-15.
- [58] 大家来改文. 群力报, 1947-02-21.
- [59] 太行新华报社. 本报更加地方化讨论意见(内部资料)//刘江, 鲁兮. 太行新闻史料汇编, 1994: 66.
- [60] 编后语. 棠梨沟农民的写作. 冀热辽导报, 1948-03-20.
- [61] 胡均. 介绍一篇稿儿女民兵打坝. 紫石大众, 1947-12-23.
- [62] 工农通讯员黄玉华. 缴粮模范陈如兆赏他一面飞机旗. 盐阜大众, 1948-07-07.
- [63] 工农通讯员张子芳. 费斋华. 坚决反对打内战. 盐阜大众, 1946-05-08.
- [64] 龙伟. 成为人民报纸: 新中国上海报业的历史变革(1949—1953).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6.
- [65] 王仲莘. 序(内部资料)//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花甲群力——《群力报》创刊六十周年纪念专集, 2005: 3.
- [66] 潘佼佼. 中国农村广播网发展研究.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3: 67; 71.

Newspapers as the “Journalism Textbook” for the Mass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for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Tian Zhongchu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became a significant social phenomenon. To facilitate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practices among these correspondents with limited literacy, numerous newspapers leveraged their advantages of extensive circulation, short publication cycles, and close proximity to grassroots communities to establish dedicated sections or column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 for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aiming to instruct them on “how to write,” “what to write,” and “how to revise.” The “how to write” component imparted foundational knowledge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s; “what to write” guided correspondents in presenting content aligned with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needs; while “how to revise” encouraged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fostered their sense of social agency. Through this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framework, newspapers functioned as a “journalism textbook,” enabling numerous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ranks of “the Party’s journalists” as they resonated with the Party’s objectives.

Key words: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newspaper; worker-peasant correspondents; journalism education

■ 收稿日期: 2024-08-13

■ 作者单位: 田中初,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 责任编辑: 肖劲草